

全球化时代的文论对话

——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国际高层学术论坛

曾庆元 张荣翼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全球化时代的文论对话

——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国际高层学术论坛

曾庆元 张荣翼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时代的文论对话——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国际高层学术论坛/曾庆元, 张荣翼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7-07598-7

I. 全... II. ①曾... ②张... III. 文化—研究—文集 IV. 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3366 号

责任编辑:李 珊

装帧设计:徐威波 徐威贺

全球化时代的文论对话

——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国际高层学术论坛

曾庆元 张荣翼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印张 17

字 数 300 0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598-7/I·1012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序言

“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国际高层学术论坛”过去一年多了,呈现在我面前的是此次会议主要论文的结集。记得当时动员我们的研究生参加会务工作时,我曾经说这次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是“学术大餐”。所谓大餐,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作为压轴的大菜,菜肴原料和制作堪称精品;二是它应该有多种菜品的搭配,各显风姿,相映成趣。无疑,我们主办的此次高层学术论坛,就完全符合大餐的这种标准。

首先,我们有国际上知名学者所提交的论文,这堪称学术上重量级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希利斯·米勒的《谁害怕全球化?》,论者是著名的“耶鲁学派”代表之一。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参加会议并提交会议论文,这是对我们会议的极大支持,我相信可以通过阅读他对全球化的认识,使我们了解到大洋彼岸的主流学者对此问题的某种见解。会议论文另外还有九位“老外”的,他们也是在其国内乃至国际上非常活跃的学者,其中的巴巴拉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的重要理论家,曼斯菲尔则则在生态批评领域提出过有影响的观点,等等。此外,与会代表中还有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谢少波先生、刘康先生等。

其次,这里收录的还有若干国内学者为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按照会议的主题,主要分布在“文化研究”和“现代性”这两个议题上。其中华中师范大学的张玉能先生,四川大学的王晓路、肖薇先生(合写),马睿先生,江西师大的陶水平先生等人的论文算是兼跨两个方面,体现了一种开拓的思路和广阔的视野。

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
等,则针对一些个性
生对于文艺学领域展:
蓓先生在生态批评问;
的生命与文学的相关
的学术思想。

在论文集中,还有
艺学专业的几位老师的论文。这些论文都从各自论还用度体现了各自的字不而
性。李建中的论文以周易、老庄、孔孟的诗性言说为中心。他认为,天之“文”与
两仪并生,人之“文”与两爻并生。只有回到两爻之间,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人之
文的诗性魅力,也才能真正把握中国文论的诗性魅力。冯黎明从地域化和总体
化的关系,论述值得关注的现代性问题。唐铁惠的论文涉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文
化霸权问题。拙文则提出现代性问题上的“原发”和“后发”的差异问题,认为现
代性是普遍化的概念,而这一普遍化的概念在各个地区的表现可能会有很大差
别。

应该说,这些姿态各异、角度不同的论文汇集在一起,在“文化研究与现代
性”这一共同议题下提供了多个理论的研究视点和理论研讨的思路,参加这次
会议,对我来说既是和同行之间的交流,也是一种积极的学习。通过品读这以上
的论文,我相信读者也会认同我的这一总体评价。

在我看来,我们的会议议题需要长期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思考才能够有
比较清晰的认识。而在这种思考的过程中,思考的阶段性结果在于,通过思考之
后有了更多的困惑而不是对于问题的一种答案。譬如我的论文探讨后发现代性
问题,在我看来,后发的现代性一方面过于亦步亦趋,完全缺乏作为原发的或者
先发的现代性的欧美地区的那种创新精神;可另一方面后发现代性又多少有着
对现代性的一些改写,而学界对此的关注、重视和认识都很不够。如二战期间日
本打下美国统治下的菲律宾,又攻克了英国占据的新加坡,当时日方的宣传机器
宣称,日军此举是把亚洲从欧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而这样一种宣传对于当时

的怀有民族主义情愫的亚洲知识分子是具有一定魅惑力的。欧美的现代性从强调人的解放做起,它提出一种人类诉求,强调人文价值的普适性,可是在后发现代性的日本则强调族群意识,而这样一种畸变在后发现代性的地区可能具有普遍性。在20世纪80年代的伊朗,当时的国王巴列维顺应现代化的要求而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伊朗在海湾地区成为经济上最具有活力的国家。政治上也开始实行政权的世俗化,这属于国家的整体运行的现代性转换。可是,巴列维的改革导致的结果是,它支持了霍梅尼的上台,此人鼓吹依靠伊斯兰教义治国。伊朗由此开始了一段由世俗化的政治重返宗教化的历程。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巴列维是追求现代性建设的,可是作为反对者的霍梅尼一方鼓吹对于君权统治的革命,在此过程中采取大规模群众集会发表反对派意见以对当局施加压力的模式等等,其实正是现代政治运动的典型形式,难道就不是一种现代性的表现?在后发现代性的地区,由于欧美的现代性的成功而引发出自身对于现代性的诉求,可是这种诉求由于结合了受到西方压制之后的应变的动机,实际上就和作为启蒙运动之后的思想学术更新的西方现代性有了差异。在现代性的后发地区,往往不是现代性和非现代性的冲突,而是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在这里所谓的后发的现代性不只是时间的滞后,而且也是性质的变异。这种变异在现实中形成一种和既有的主流地位的现代性的对话。

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来讨论文化研究和现代性的问题,就不是单纯的学术的切磋,它还可以包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现代性的文化进程的不同审视。这样一次高层学术论坛其实也就是意图寻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学者和欧美国家学者的学理的沟通。应该说,包含的问题是很多的,甚至也不能期待得到一种共同的认识,所谓学术交流达成共识的情况并不多,但是只有交流我们才能在知道别人观点的同时也知道别人的思路,同时也让对方知道我们对于他们观点和思路的反应,以及我们对于问题还可能有哪些新的不同于他们思考的角度。在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一段文字我想在此引用,我认为:“文化是需要一定历史作为积淀的,即使是吸收外来的某种文化,也需要假以时日进行消化,这样所引进的文化才能够真正溶入到民族生活的血液

中。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文化改造进程中,它把原有文化破坏了,然后移植过来的一套文化以及它以后的变化都与被引进地区无关,而引进地区在使用这样的看待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时,其实就成为应声虫,在仿佛自己也可以自由表达的形式下,其实‘基本’的思路就‘基本’上是按照别人的路径在行进,有些相当于电脑芯片的工作。”在这种电脑芯片的工作形式中,新的运算都是原有的程序系统下的发挥,不可能有创新意义的表达。而我们觉得至少在面对后现代性、面对本土文化资源和现代性的关系、面对文化遗存和文化无意识情况下进行文化研究等问题,仅仅从西方学者的眼光来看待是不够的。

这篇序应该结束了,不过作为对问题的思考,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刻。实际上我们目前就在筹备 2008 年的会议,期待着有更好的交流和对话。

张荣翼

2007 年 9 月于珞珈山

目 录

序言	/1
谁害怕全球化?	J·希利斯·米勒/1
关于21世纪研究的少数派报告	汤姆·科恩/9
幽灵徘徊的问题	
——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和雷蒙·威廉姆斯的《现代悲剧》	
	帕梅拉·麦卡锡/15
效率的意识形态: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洼地》凸显的现代性	
	伊芙琳·格伯雷/22
辩证法与左派倾向	巴巴拉·扶雷/28
何谓非地狱?	布鲁斯·罗宾斯/33
福柯之后的可选择的现代性问题	卡塞林·皮雷/38
记忆与活动影像:关于现代性的怀疑论注释	米甘·莫里斯/43
可选择的现代性何以可能?	
——德里达,全球化以及自身免疫系统	尼克·曼斯菲尔德/49
语词的庇佑:全球化危机时代文学的变革功能	盖布里埃乐·施瓦布/56
文化理论与多元现代性	
——以文化理论关键词为例	王晓路 肖 薇/63

论文化批评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	张玉能/70
都市文化研究:范式及其问题	曾 军/93
“反本质主义”的佯谬与霸权意识	唐铁惠/101
罗兰·巴特与索绪尔: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的形成	屠友祥/106
后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文学	张荣翼/121
两爻之间的文化诉求	
——以周易、老庄、孔孟的诗性言说为中心	李建中/132
文化的地域差异性与国家意志的总体化	
——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方面	冯黎明/142
文化自觉、文化战争、文化立国	
——世界“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三部曲	张 杰/153
意识与方法:“文化研究”对现代性学术体系的批判	马 睿/170
“浪漫生态学”何为	刘蓓,李衍柱/175
全球化时代生态批评的生命智慧与文学盟约	龚举善/186
“批判”的剖析:审美主义如何构成一种社会批判?	吴兴明/200
什么是审美体验	
——海德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与审美体验理论的现代改造	刘成纪/216
略论文化研究的后现代性	陶水平/228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性别身份	刘 岩/236
离散心境中的文化诉求	
——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闽南文化情结	戴冠青/251
交流·突破·拓展	
——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国际高层学术论坛综述	李 松/261
后记	/266

谁害怕全球化? J·希利斯·米勒*

我的问题也许可以重述为“谁应该害怕全球化?”标题的问题的答案是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在害怕全球化,包括环保主义者、孤立主义者、贸易统一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心在滴血的自由主义者”等不同类别的人。这些人在世界银行会议、WTO 会议期间举行抗议活动,并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害怕全球化的人还包括那些处在非西方国家的一些人,他们担心全球化无非意味着或多或少的美国化,其后果将是对各地的本土文化的摧毁。他们担心,与之相随的,将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总体霸权——我们的新保守主义者以一种狂躁的欢欣天真地称之为“世界新秩序”。然而,害怕全球化的人也包括美国人。一些美国人希望对非法移民施以重罪,将他们都驱逐回墨西哥,并在得克萨斯和墨西哥边界建立起长达七百英里的围墙。还有一些美国人因为美国的“外购”政策而失去工作,悲哀失落,在过去的几年里,单以对中国的日趋加大的商品和服务的采购就导致一百万甚至更多的就业岗位的丧失,并伴随着对中国的巨额财政赤字。中国的这些商品通常制作精良,产品维修也实施得很好,特别是在像大连这样的经济中心。同样的商品和服务,中国和印度只需要少许成本,而在美国却要高得多。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美国和欧洲生活水平的下降,并逐渐遍及各地;越来越多的高技术和高报酬的美国工人将面临“下岗”,因为他们所能做的,在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做得同样好。这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世界的平整化(the flattening of the world)。

是否这些陌生的人群应该如此害怕全球化? 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害怕全球化,是不准备去阻止它,而且,害怕,是我们对待这一具有不可预测的规模和快速特点的全球变化的一种不好的心理状态。最好是能够理解它、利用它,以一种

*J·希利斯·米勒,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英语和比较文学系。

建设性的方法改变它，——这当然并非易事。无论如何，全球化，不会自行停止或消失。

什么才是我们当今全球化的形式？它是一种具有多重特征的奇怪的混合物。而且，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以一种不同的比例、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式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发生的。各地都有众多的人群完全没有被全球化，或者只是轻微的全球化。比如我的妻子，她至今还没有学会使用计算机。我必须为她在网上搜集信息，并把她用铅笔给儿孙们写的书信打印成邮件。另外，人们还应该牢记全球化已经伴随着不平等的经济掠夺、种族战争、灾难和死亡。关于全球化的这一方面，雅克·德理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意味深长地说“当一些人（例如弗朗西斯·福山）以自由民主制的理想的名义——这种理想自诩为最终将是人类历史的理想——无耻地宣扬新福音之际，人们必须大声疾呼。那种新福音宣称，地球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人类将不再受暴力、不平等、排外、饥饿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压迫的影响”。（p 85）德理达写下这些话的1993年的真实情况，在时隔13年后的今天，可以说是更加真实，更加明显了。

我曾经说过全球化是一个异质的过程，经济的全球化与计算机、手机及电子邮件这样的远程技术手段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绝对依赖后者。这两者又和环境恶化不一样，后者主要由所谓发达国家引起，将导致全球变暖。此三者又都和媒介的全球化不一样，尽管它们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发明。媒介的全球化，和其他事物类似的方面，是新闻和广告在全球范围内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即时传播，同时媒介也日趋集中在威廉斯和默多克这样的传媒巨子手中。但是，大众媒介的全球化与其他事物的全球化毕竟不同，因为电影、电视、电脑游戏和流行音乐的全球扩散具有内在的文化权力，尽管它们使用着同样的变戏法似的远程技术装置，如 iPods（MP3 播放器）、无线网络、光缆、通讯卫星、计算机及日趋复杂的手机，以及随之出现的电子邮件、数码摄像、视频会议、玩家游戏和基本计算等。

全球化的所有这些特征中的关键因素，或者说其公分母，是新的传播技术，没有这些技术的发明，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是不可能的。没有移动电话、计算机和 iPod，就没有全球化，至少没有当今如此夸张的态势。这些技术装置在异常短暂的时间内就扫平了世界。我记得，就在几年以前，当时最早的浏览器“马赛克”，就能提供进入一系列网站的通道。现在的万维网拥有 6 000 亿个页面。托马斯·弗里德曼写过关于新的全球技术所带来的影响的书——《天下一统》（The World Is Flat），内容翔实，发人深省。

他不仅指出新技术和全球经济正或多或少地渗透到各地,还进而提出,从长远来看——事实上已成事实——这一统一的(平整化的)世界或水平竞技场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力量,而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带来更多的经济和文化权力。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更明智地行使这一权力,比美国在这些年所做的更明智一些。我们是在用经济、技术和军事的力量来摧毁自我和他者,诸如引起无数的环境破坏、加剧全球变暖,积欠的巨大财政赤字迟早会引发经济崩溃,更不用说在伊拉克的战争和对伊朗的威胁。

现在,新技术的全球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首先意味着大学和学术的变革。只要拥有一台电脑,如今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载有学术信息和在线文本的极大的分配数据库,其中包含各个方面的权威研究。拥有印刷书本,曾经是人文科学的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基础,现在越来越没有必要。比方说,拥有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复印本,如今已没有必要。它们在網上几乎都可以免费获得。在近期的任意一篇文章中,我通过 Google 几秒钟内就搜索到《共产党宣言》的在线版本并加以引用。学术合作可以由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人员组成的团队来实施,而不必局限于居住在同一所大学的人员。我今年就参与了位于奥斯陆的一个高级研究中心的一个关于表层叙述学的宏大的研究项目,尽管在这一年内,我会在那儿呆上总共三个星期的时间。研究论文用电脑书写,并通过邮件即时传达到世界各地。我所有的建议信都在电脑上写作,并将其中的大部分以邮件方式发送。他们也用邮件将论文的一些章节传送给我。我学会在电脑屏幕上阅读、注释和评论它们。我在过去一天一天形成的职业习惯,在短短几年内已经被电脑完全改变。

这些新的电传装置也给伦理和政治生活带来了急剧的变化,至少在我的国家和全球化所能达的其他地区是如此。通常的道德交往模式是家庭成员和邻里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有血有肉的实体,就像莱维纳斯(Lévinas)的伦理学著作《面容》(visage),或者德理达探讨道德生活的模式的著作《友谊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死亡的馈赠》(The Gift of Death)以及其他书中所描述的情形。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多数西方小说都聚焦于面对面的相遇的描述,因为道德的冲突以及决断都是在这种情境中发生的,尽管有时书信也很重要。安东尼·特洛罗普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主要是由两个人物的对话冲突的系列场景所组成的。我们以特洛罗普的《巴赛特郡》(The Last Chronicle of Barset)中的一个感人的场景为例。副主教格兰特利对格雷丝小姐

作为他儿子的未婚妻心怀不满,因为她贫困潦倒的父亲曾因偷窃(后来证明没有这回事)而遭受谴责。而在他真正遇见她的那一刻,这种不满顿时化成了爱和倾慕:“当他俯身凝视着她的脸,两行热泪从他眼里涌出,慢慢的顺着鼻子流下来。‘我的女儿’,他说,‘一旦这朵阴云从你头上散去,你将来到我家成为我的女儿’。”(企鹅经典版,p 595)

当今的道德生活与特洛罗普反映的现实已有了天壤之别,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道德关系可能以一种或多种新技术为中介(而不再是面对面的方式),人们通过 E-mail、聊天室、博客(podcast)、计算机集成游戏等等方式与他人交流。我自己的一个家庭成员现在就与他当初在网上结识的一个女子幸福地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在同一个相当神秘的网站内有許多共同的兴趣。而她居住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地方。

如果说全球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道德,那么它对政治生活的改变就更有戏剧性了。在德理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中有一个有力的段落描述了西方式的古板的议会民主方式是如何被电视所摧毁的:

……政治家在这个时刻已越来越成为,甚至可以说是传媒呈现的唯一的人物,在这个时刻,公共空间的变化,确切的说是传媒导致的变化,使他们丧失了权力甚至是能力的本质部分,这些权力和能力以前是通过议会代表制的结构,通过与议会代表制相联系的政党机构等等途径授予他们的。无论他们个人能力如何,适应旧模式的职业政治家们今天已在结构上变得不能胜任……他们被认为是政坛上的演员(actors on politics),他们现在常常冒险,但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他们不过是电视演员而已。(p 80)

我进而还要说,自 1993 年以后,至少在我国,所有其他的电传技术已经介入议会民主政治——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使议会民主失效,至少改变了它的传统功能:电子投票机器可以轻易改变结果;政治性在线博客影响人们投票;广播谈话秀产生巨大政治影响;根据电子汇集投票统计的结果不公正地划分选区;电子统计的民意测验结果被即时传播;令人厌恶的大小公司与政府的联盟,——比如通过院外游说,称为医保 D 部分的联邦药物报道就由制药公司撰写,或为制药公司利益而非为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写,政治家拥有并指导媒介,比如福克斯新闻公司就以电话销售的名义聘用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前领导人来管理公司,显然,在上届总统选举期间,它在白宫的授意下干扰了民主党的投票工作。(http://www.nytimes.com/2006/04/17/opinion) 政府还显然与

AT&T 公司合作,对美国公民实行非法电子监控:“无需经过法律授意,允许政府倾听民众的电话,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监测他们的上网活动”(<http://www.nytimes.com/2006/04/17/opinion>),等等。所有这些道德和政治生活的变化完全与新的电传技术分不开。甚至有可能——就像汤姆·科恩所做的——将这种新的情境称作“后民主”。

全球文化研究起初看来是全球化的一个特殊的角落,但“文化研究”是一个令人苦恼或者令人欢欣的模糊的词,依赖于你怎么去感受它,(……漏词)。按照泰伦斯的名言“……”(拉丁文),没有什么人类事物不能属于文化研究。

顺便说一句,我是在几秒钟内通过 Google 找到这句引文的。这是新的全球技术给我的工作带来影响的一个极佳的例子。Google 是令人惊异的,就像 Wikipedia,网络在线,写作接龙以及不断刷新的百科全书一样。Google 和 Wikipedia 消除了竞赛的差异。你只要拥有一台电脑,就不必和大型图书馆离得很近。保守的教授们可能说这也太容易了。学生们不再学习怎样使用图书馆,或者学习区分好的信息和坏的信息。其实,任何图书馆,同样包含有一些坏的和不准确的信息,相比之下,Wikipedia 上的坏的和不准确的信息总是很快就被一批专家组成的志愿者所祛除、订正。我的博士导师道格拉斯·布什常常说“学问主要是跑腿活”,他的意思是你要获得学问,就必须在研究性图书馆的长达几英里的书架前走上数回,但现在我认为在图书馆苦干已没有特别的价值。

我已经提到,在文化研究领域内,你可以做任何你多多少少喜欢的东西。比方说科学史,包括这些新的传播装置被发明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研究的形式,就像对于烹调和服饰的习俗的研究,对广告、对人们“玩”股票的方式、对跨国公司的“文化”的研究,就像阿兰·刘在他的一本精彩的书《酷的法则》中所作的那样,等等。文化研究实际上更接近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的社会科学,而不是我们在人文科学中的传统的语言文学系所习惯从事的工作。最近我所在的大学就在我们社会科学学院成立了一个新的民族志研究中心。根据新闻发布的消息,“中心将从人们的经验视角探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心的主要研究项目——由英特尔公司提供赞助——的目标之一,将是了解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对于‘公’与‘私’的定义。对我来说这应该就是文化研究。我对于人文系正以社会科学的形式重塑自身没有异议,不过我确实认为用民族志和社会学的规则来训练想要做文化研究的人文学者将是一件好事。如果说从事文化研究应该对社会负责任的话,这甚至是非常必要的事情。我认为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对伦敦、纽约、

新德里和北京的服饰习俗做比较研究的人来说,训练他们读莎士比亚没有特别的意义。

实际上,在人文科学领域,对电影、电视、计算机游戏、时装、时尚杂志和流行音乐等现代“大众文化”方面的强调,常常占据了文化研究的中心舞台。许多文化研究的从业者过去更多地接受传统人文学科的训练,这是自然的事情。其所以转向文化研究,唯一合理解释是年轻的人文学者需要研究这些事情。这些文化形式与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文学相比,对意识形态以及日常生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这些新的文化形式具有更实际的效用。计算机游戏产业比整个好莱坞的利润还要大得多。我的大女儿杰茜卡(神经学专业的研究生)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叫“战术世界”(World of Warcraft),由 Bizzard 娱乐公司开发,在 2005 年,在中文版出现的头一个月内,它在中国就有 150 万订户。(http://blizzard.com/press/050720.shtml)

像电视新闻一样,这些新的魔法机器奇迹般的制造无所不在的虚拟现实。世界各国的电视新闻,都通过精心的巧妙制作,使它看起来像是当下现实。事实上电视新闻是用非常复杂的狡黠的手段建构出来的,就像德理达所称的“人造现实”。我们被这样幽灵般的虚拟现实所包围。我们凭借它们而生活。最令人惊诧的是这些新发明,比如手机和电脑,是如此快的扫平了全世界,就像 iPod 和电影一样。它们看来是不可抗拒的。你可能争辩说是否这些新玩意会使得人人都美国化,那仅仅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拒绝使用它们。没有人迫使人们使用 E-mail、手机或 iPod 播放器,各地的人们就已经迫切的拥抱“美国化”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是人们显然需要虚拟现实。他们拥抱技术提供给他们的人造现实,从印刷书本到 iPod。人们进入幽灵般的虚拟现实就像鸭子扑入水中一样。这是真正令人惊奇的人的习性。这些装置迎合了人的需求,正如文学在它的全盛期回应了读者的需求一样。阅读一本特洛罗普或者狄更斯的小说(我进入虚拟世界的习惯方式)其实就像玩电脑游戏或者看电视晚间新闻或看电影,只不过进入人造世界的方式有较大差别。但在本质上,它们仅仅是技术魔术的不同形式,当今的技术魔术采用了我所说的魔法化的形式。所有这些魔术需要一些物质手段,如书页上的词语,屏幕上的图像以及与之相随的声响,从手机里抵达我的耳朵的声音以使我确定是我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是一种招魂术,这是对虚拟现实研究的当然话题。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断和德理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的详细阐释,它

本质上是自然世界的宗教。任何时代的虚拟现实机器都是一种传播意识形态鬼怪和幽灵的工具,这些鬼怪和幽灵包括电视荧屏和电影中的影像,包括我在阅读某本小说——特洛罗普的《巴赛特郡》,或托尼·莫里森的《至爱》,或者哈金的《等待》——时在我眼前出现的幽灵。

一方面,这些新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是冷漠的,它们不过是无言的机器。它们不能指示其用途是什么,但是它们确实塑造这些用途。你可以用任何一种语言对你的手机说任何你想说的话。一个中国人在大街上用手机说话和一个美国人对手机的使用相比,是对这一机器的意义大不相同的使用。播客技术也可以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另一方面,这些装置确实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对他们的“文化”造成了根本的变化。

提出这一问题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些论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理论太轻易的假定人的单一性。我认为,一般的人,能够很快地成为许多不同的人,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比如说,他们能够在保留许多或大多数传统文化特征的同时使用电脑和手机,这些传统文化包括饮食和穿着方式、求爱和结婚的形式,更重要的也许还是特殊的本土语言的特异性。理解这一点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那些在呼叫中心工作的人,他们经过训练而用不同声腔语调——美国的、加拿大的、澳洲的和英国的——说惯用的英语。他们一天工作数小时,拿的是(在美国人看来)极其低下的报酬。然后他们回家吃中餐,用中文思考和言说,用中国的方式与亲人和朋友相交往。他们是混合性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并且一直是不同的异质的人的聚集体。当前的人的状态只是人的习性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当前条件下,每个人都可能一下子成为众多完全不同的“他人”。

我曾经在别处说过许多关于在此文化研究的年代保持文学研究活力的价值,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根本区别,关于理解文学需要阅读哲学和理论等问题。我已经证明,文学研究,是且应当总是特殊的,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应努力阅读这本或那本文学著作,穷究它的独特性和非凡性,而文化研究,像人类学和社会学,更倾向于对事物的典型性和一般性感兴趣。

但是,我想说一些明显不同的事情来结束这番演说。我认为当今全球文化研究的最急迫的任务,是对这些全球化的基本必需品、这些新的传播装置究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作本土的、然后是比较的和高度经验化的研究。与其说流行音乐本身应该研究,不如说流行音乐在世界各地之间的传播以及随后特殊文化处境中的特殊的人们如何通过 iPod 播放器聆听音乐应该研究。与

其想当然的认为电影对所有观众具有同样的、普遍的内涵,不如研究在不同的地方文化中人们不同的观影方式和反应方式。与其假定手机在各地都会产生同样的普世的影响,不如研究手机在本地特殊使用。与其假定计算机或 Google 这样的搜索引擎在全球产生同样的影响,不如研究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实际上是如何使用这些装置的。玩电脑游戏、收发邮件或者创造自己的播客,在不同的特殊的环境下对人们的个性到底有何影响?在我看来,这才是今天的全球比较文化研究的前沿课题。如果让我的生命重来,我将在教学和写作中终生进行这样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将不仅仅是客观的描述和分析。它应该以教会人们如何最好的使用这些新技术,如何避免成为所有这些幽灵般的人造现实的被动的接受者,恰如在过去,当文学是公民道德的主要的铸模的时候,新批评这样的学科将教会人们把阅读视为自己的目标。

什么样的技能将是这些新的学科所必要的,在这些学科再难以以一致的制度化的方式存在的时候?这些技能将与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院所接受的、准备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所需要的技能是很不相同的。这一新学科的未来面貌如何,将留给那些发明它的人。但是,我可以断言,它将凭借敏锐的分析,与似乎不可能联盟的民族志的研究程序和规则联系在一起,同时拒斥所谓解构的陈旧的解释学,在电影研究中,汤姆·科恩的令人钦佩的著作《希区柯克的悬念》(Hitchcock's Cryptonymies)为这一新学科提供了一种模式。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李作霖译)